

外国文论的记忆与展望

任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以下简称“理论室”)建室30周年座谈会暨研究室建设规划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者结合理论室的发展历程,既深切地回忆了我国外国文论的建设进程,又前瞻性地展望了其未来发展方向。

早在1966年,冯至先生有感于当时文学研究理论建设紊乱,认识到外国文学研究亟待建立自己的理论队伍,遂提议建立理论室。但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此提议才得以成行。

1981年秋,理论室成立。可以说,其最初动因来自前辈学者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使命感。岁月荏苒,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学人如今已是著述丰赡、年高德劭的大家。回首当年,吴元迈、叶廷芳、章国锋、郭宏安、吴岳添等先生难掩激动之情。作为理论室第一任主任的吴元迈先生充满感情地回忆了当年理论室创建的缘起和过程,勉励大家继往开来、把握机遇,做一个清醒、坚定、有作为的文论工作者。叶廷芳先生结合自己的治学道路,回顾了30年来国内外外国文论研究状况与理论室在国内相关研究中作出的开创性贡献。章国锋先生从改革开放初外国文论的大量引进谈起,表达了对目前文学被边缘化现状的忧思,提出在娱乐消费至上的时代,文论研究一定要将坚持理想与关注现实结合起来。郭宏安先生认为既要长期坚持文论和文学思潮的介绍评述工作,也要重视后续研究。学者在学术上要心有定力、有所守成,避免盲目跟风。吴岳添先生饶有兴致地谈起当年白手起家建立理论室的情形,深深有感于知识分子在清贫中坚守理想的执著精神。30年,对于历史长河来说不过是白驹过隙,但对于个人来说却是一辈子的学问人生,对于外国文论学科发展来说,是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是几代人共同担负的文化使命。20世纪80年代,理论室前辈在外国文论的译介和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翻译的外国文论著作与外文所其他学者所选译的外国文学名著研究资料一道,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现象的一种标志,许多学人就是在阅读他们的译著和著作中成长起来的。曾在理论室工作的冯季庆、蒋卫杰,对理论室思想活跃、团结进取的风气记忆犹新,希望这种优良传统能够一直传承发扬下去。

理论室现任主任周启超研究员介绍,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理论室已成为多语种、多领域的文论研究机构,有马列文论研究、法国文论研究、德国文论研究、俄苏文论研究、英美文论研究等传统研究方向,也有欧陆文论研究、斯拉夫文论研究、比较诗学等前沿研究方向,在外国文论界发挥了良好的引领作用。多年来,理论室与院内乃至国内同行携手合作,相继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巴赫金研究分会等,在开拓外国文论研究平台、整合国内相关研究资源、构建多重会通的外国文论学科格局、深化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介入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实践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周启超提出,要继续发挥理论室团结进取、不断开拓的优良传统,继续培养乐于合作意识、勤于开拓意识和敢于担当意识,继续坚持跨文化的文论研究路向,多方位地吸纳、有深度地开采,努力实现由国别文论研究走向跨文化的文论研究之结构转型,积极发挥在全国外国文论界的学术牵引作用,不断提升对于全国文论建设的学术影响力。史忠义研究员提出,理论室在今后研究中要注重两点:一是着力于中外文论比较研究,二是重视文论与思想史的关系研究。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对理论室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不少中肯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并对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剖析。党圣元书记指出,理论室的未来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一要充分挖掘现有人才的潜力,二要更关注现实,三要以问题意识带动学术研究,结合社会现实反思学术问题。董晓阳副所长认为,此会充分显示了理论室建设

的传承性，如何把创新工程的整体设想与对人才的吸纳、包容及个人研究适当结合起来，是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吴晓都副所长指出，理论研究既要关注前沿，又要注重传统理论资源；既要担负传承文明的使命，又要坚持理论创新；既要重视研究，又要把握好政治方向。